

儒学与

云南政治

经济的

发展及

文化转型

木芹 木霁弘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K297.4
M948:1

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 的发展及文化转型

木 芹 木 霖 弘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木芹 木霁弘著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8
ISBN 7—81068—105—2

I . 儒… II . 木… III . 儒家—社会影响—云南 IV . D6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748 号

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

木 芹 木 霁 弘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千

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81068-105-2/B·24

定价：22.00 元

弁　　言

光辉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共同创造的，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一起谱写的，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整体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机地连结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过去，又将携手走向未来，这是历史必由之路。

一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她的文化空前繁荣，首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兵家等，其中儒家的以礼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尚贤、尚同、非攻、兼爱、节用、节葬，法家的法、术、势结合的以法治国，这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此后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论基础，是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其次，诸子散文大放异彩，如孟子文章善辩犀利，庄子文章海阔天空，荀子文章气势磅礴而明晰，韩非文章锋芒毕露而尖刻，楚辞创立新诗体，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影响深远；青铜工艺造型别致精巧，有铸纹、鎏金纹、刻纹，图像复杂生动；毛笔帛画线条流畅；音乐则有春秋时的浙川编钟和战国时随县的成套乐器，这说明当时已使用七声音阶，12个半音齐备。第三，在自然科学有专门观测星象、研究天文的甘德《天文星占》、石申《天文》，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有了一年365日又四分之

一日，采用 19 年 7 个闰月的置闰表，一年 24 个节令；有了辨别方向的“司南”；病理学上已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不调，后发展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已有切脉、望声、听声、写（观）形的方法，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诊治；光学上认识了直进率；数学上已应用角度，以及点、线、面、方、圆等概念，还有九九诀等。总而言之，华夏人已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基础浑厚、后劲充足传统文化，这为以后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石。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统一封建专制国家，自上而下采取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和统一法律的强有力措施，致使原为各国政治界线所阻隔的局面被打破。汉承秦制强化了统一的措施，从而迅速改变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尤其是由于地主经济的发展，促使华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性空前加强，当时有名的陇、蜀的丹漆旄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毡裘，充、豫的漆丝绨宁，这些养生送终之物，经工匠加工制作，由商人用舟楫通川谷，赶牛驾马以达陆陵，致远穹深，互通有无，终于在西汉前期，秦人、齐人、楚人……诸多称呼逐步消失了，代之以汉人，从此以后汉成为民族的专称，于是居住在北黄河、南长江，东滨海、西巴蜀的汉民族，成为空前强大的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由于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人数最多，幅员辽阔，自然在中华各族的历史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汉民族的经济载体是农业文明，有极大的稳定性，并对周围的草原民族、山地民族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加之汉民族建筑在农业文明之上的封建地主经济，二千多年间，在各族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因“分田无限”所付予地主经济的兼并性，土地的兼并性，辖区的扩张性，使地主经济具有一定的冲破地域、民族界

限的冲击力。

在二千多年间，建立在汉民族地主经济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在国家的发展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这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而且成为调节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的强有力的政治杠杆。高居多民族封建国家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除了政治上因循守旧而封闭外，还有不受地域和民族界限约束——开放的一面。它具有局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它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不断调节着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关系。

以儒学为核心的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汉族文化，由于它的先进性，以及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并具有加以消化的能力，对各少数民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强劲的渗透力。

总之，汉民族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和强制力，经济上强有力的联结性，以及文化上巨大的渗透力，确定了她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核心地位。

二

孔子开创儒家学说，其学说便以其独特生命力获得大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学犹如长江大河，纳万川于一体，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脉。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内的云南，也在儒学的覆盖之下。儒学对云南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云南地处祖国边疆且有众多少数民族，故儒学在云南又有不同于内地的地方，自有特色，为阐述儒学在云南边疆的发展传播和其特殊性与共性，故撰《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一书。书稿共九章：第一章，儒学对云南的浸润：分儒家、儒学和大一统——向边地扩散儒学的政治渠道——汉语言

文字与儒学的传播等三节。第二章，儒学在云南的趋同变异：分汉唐间云南儒学的特点——儒家政治思想的传播途径和制约因素二节。第三章，儒学在云南的成长：分云南地主经济的产生——儒学兴起与土地买卖同步——云南建立行省是地主经济确立的强有力的政治杠杆——儒学的发展使云南人习礼让举止风化——地主经济的发展与儒学的倡导等五节。第四章，明代儒学在云南的阐述：分广设学校——明代云南学额及入学生员——明代历科云南进士题名——明代滇人著述等四节。第五章，明代云南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与儒学的跨越：分明代卫所与云南儒学——地主经济推动着儒学的昌盛二节。第六章，儒学与改土归流：分儒学促进了云南社会风气的变化——土官与土司——改土归流——三个典型等四节。第七章，清代云南儒学：分清代云南书院和义学——清代云南学额——清代历科云南进士题名——清代滇人著述等四节。第八章，18世纪云南经济的跳跃：分清初云南百废待兴——云南人口的增加及耕地的扩大——水利设施的改善——农作物新品种的引种——矿业的蓬勃发展——食盐的自给——交通市集形成网络，货币与内地接轨——促成18世纪云南经济跨跃的基本因素等八节。

三

自汉武帝在云南列郡而治后，云南与内地、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板块。这种整体关系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活动，如封册、朝贡、降附、和亲、通好、盟誓、交侵、纳质、责让、入觐、请求、互市、助国讨伐等而获得巩固和发展，这也是中央王朝传播儒学，边疆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重要渠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儒学在云南的发展，也就是汉学在

云南的发展。汉晋间，云南已有人学习儒学经典，而学习汉语言文学尤盛，尽管学习者的行文用典不尽规范，但其思想内容却不失于儒家准则。而唐宋间，云南人的作品如诗文、盟辞、颂赞等等，从样式和内容都可以同中原相比肩，其作品可谓“卓然唐音”。就是说汉语言文学在云南原发文化的陆地上捷足先登，并被其所接受和运用，它为儒学在云南的渐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事实上汉晋间云南已有郡县之学，只有那些经过学校途径学习的人才能走上仕途，惟在校学习的基本上是汉族移民子弟，而又以大姓子弟为主，所以少数民族居民主要是在与汉族移民的交往中间接接触儒学。唐代，不少云南贵族子弟到成都就学，少数人则入长安学习。宋代则通过家庭和寺庙学习，故有既读儒书，又念佛经的“释儒”，而大理地方政权就从“释儒”中开科取士。总的说，汉唐间云南儒学具有文学先行、移植汉文化、兼收并蓄、思想观念上的双轨等特点，尽管处于自发的被动学习阶段，惟已进入“言音未会意相合，远隔江山万里多”的境界了。尽管汉唐间的云南儒学还缺少地主经济这张皮，但由于设治、移民、经济交往等因素，云南统治阶级由于政治经济上的贪欲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使儒学得以传播。地主经济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儒学又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之内，儒学的消长同地主经济的消长基本一致。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到了元明清三代地主经济才发展起来，所以只有在这个时候儒学才在这些民族中落地生根迅速兴起。于是形成这样的反差，即内地汉族地主经济走向没落，儒学滑坡之时，地主经济和儒学却在这些边疆民族中发展兴盛起来。云南的情况正是这样，并有其典型的代表性。

元代，自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后，先后在中庆、大理、临安、永昌、鹤庆、姚安、威楚各地建文庙，

置学田，设儒学提举，云南儒学初具规模。明代云南所有府州县均已设立学宫和书院，在校生员约 3000 人，历科云南进士约 220 余人，儒学在云南有了重大的发展。清代更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府州县的书院已达 193 个，义学 674 馆，生员约 5500 人。历科云南进士达 630 多名，形成了云南的教育体系。

重道崇儒，实行教化，这是儒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历经汉唐的潜移默化，元明清的蓬勃发展，《春秋》大一统之义和《礼》教被广泛接受。它首先表现为滇人积极入世参与朝政，从仕途跻身于国家政治舞台。当时滇人参与朝政的诸如“识量宏大，文武长才，沉几先务，果毅好谋，投之艰大，绰有余裕”的杨一清，“独立不阿”的李元阳，“为人清正，仕官四十年始终一节”的严清，等等。有的则身在云南心系国家命运的，有如丁嵩曾给明宣宗章皇帝陈首务八策而被章皇帝所采纳。其次是成批“忠臣义士”的出现，他们后身先义，身可杀，名不可死，义在与在，义亡与亡。第三是孝行和义友风行于世。他们事父孝敬，事君忠贞，兄弟和睦，朋友信诚，从官忠慎，立身廉明，待士谦让，莅民宽平，理讼正直，察狱审情。第四，民风民俗的变化。如元旦更桃符贺岁，上元观灯，清明插柳，四月八日浴佛，端午悬艾酌菖蒲酒，七夕乞巧，中元祭祀，中秋晚月，重阳登高，腊月二十四祀灶，除夕守岁饮酒，先少后老，已是云南居民的重要习俗，而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民俗节日，基本上成为云南许多民族共同的经济文化活动。总的说，元明清间在儒学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云南居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了主流。

元明清三代，由于儒学兴盛的缘故，滇人著述颇多，学术空气之盛亦前所未有，以清代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滇人著述已过

二千余种，有关经学著述共89种。属于教材的有如《易经讲义》、《四书讲义》、《十一经读本》等；具有导读性的有如《尚书要旨》、《四书扼要》、《五经略要》；属通俗读物的有如《四书七律诗》、《四书歌诗》等；属于类编的有如《十三经绘说类编》；属于专著的有如《易经通解》等。总之，滇人著书立说盛况空前。

儒学的发展，对云南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于改土归流。撤除府州县土官，任命流官，这是扩大深入中央集权的需要，也是土官地区地主经济发展所使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充满了血与火，而某些土官地区却很顺利地实现了设流，这里可充分看到儒学的作用。如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张立道建庙学于临安，继后规模有所扩大，设施不断完善，致使临安府人文蔚起，明代云南二百多名进士中，临安就有四十多人，近全省的五分之一。自成化至嘉靖初，未经多少曲折，改土归流就在该府基本实现了。又如丽江土府地未设府学，但土知府木氏世代读儒书，习礼义，在十八传中，以木公、木青、木增著称于一时，多有著述传世。他们“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河山”。忠君报国之志坚，因此之故，雍正间朝廷一道令纸，将丽江土知府降为土通判，任命流官知府，丽江改流异乎寻常的顺利，这与儒学对木氏土府家族的潜移默化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保障地主和自耕农土地所有权，实行以农为本政策，鼓励垦荒开矿，兴舟楫仓储之利，驱动了滇人前所未有的求富欲，并在儒学茂盛而造就的文化交互作用下，云南人口倍增，耕地迅速扩大，水利设施相应发展，矿业规模空前，盐业基本自给，交通、市集大体形成网络，货币实现了同内地接轨，云南经济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

儒学在云南，代表着汉文化在云南，体现了大一统中国的核 心思想在云南一脉相承，从儒学在云南发展壮大的轨迹来看，儒

学越发展，其边疆归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越坚，儒学越发展，边疆的经济文化也就越向前发展。

四

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制性和地主经济的联系性，为汉族文化的拓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汉文化本身由于自身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及其超常的稳定性，更增强了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汉族文化，甚至可以说汉族文化起了导向作用。但是，各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就是一个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地区间不平衡性，所以吸收汉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就云南而言，大致有如下不同情况：汉文化成为核心，而以本民族的形式为其载体。就是说当本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形成之时，就开始接受了汉语言文字及其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思想和伦理道德，等等。当然也还保有自身的民间文学，某些习俗，乃至宗教等成分，即前者为里，后者为表；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汉族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主流，前者退居次要地位乃至附着在汉文化之上了；先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后接受汉族文化，既发展本民族文化，又推进所引进的汉族文化，成为双轨运行，前者多在民间，后者多在知识阶层和统治阶级之中，二者还未完全达到交融的发展时期；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并逐步为前者所消化，但仍具有浓烈的民族色彩和韵味，即仍沿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轨迹前进；人口不多居住地域较小的一些少数民族，正处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所以其传统文化正在形成之中。其中接近汉族而居住者，开始吸收汉族文化；一些少数民族或某一民族的某一部分，他们还处于父系氏

族公社阶段，所以基本上是原生文化。总之，民族文化与经济相适应，造就成大大小小的民族区域性文化，即在汉族文化的周围形成了众多的较大的民族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性民族文化的周围又迂回着更小的民族区域性文化。

不论是汉族，或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是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内生活，所以每个民族毫不例外地都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加上各族相互间都在发生着融合，这就决定了各族文化的多元性。

目 录

弁 言	(1)
<hr/>	
第一章 滥觞汉唐 衣被后世 (上)	
——儒学对云南的浸润	(1)
<hr/>	
一、儒家、儒学和大一统	(1)
二、向边地扩散儒学的政治渠道	(6)
三、汉语言文字与儒学的传播	(9)
<hr/>	
第二章 滥觞汉唐 衣被后世 (下)	
——儒学在云南的趋同变异	(21)
<hr/>	
一、汉唐间云南儒学的特点	(21)
二、儒家政治思想的传播途径和制约因素	(43)
<hr/>	
第三章 适时而兴 落地为根	
——儒学在云南的成长	(60)
<hr/>	
一、云南地主经济的产生	(60)
二、儒学兴起与土地买卖同步	(66)

三、云南建行省是地主经济确立的强有力的政治杠杆	(70)
四、儒学的发展使云南人习礼让举止风化	(76)
五、地主经济的发展与儒学的倡导	(81)

第四章 教化信仰 儒学茂盛

——明代儒学在云南的阐述	(90)
--------------	------

一、广设学校	(90)
二、明代云南学额及入学生员	(94)
三、明代历科云南进士题名	(98)
四、明代滇人著述	(110)

第五章 春日载阳 相得益彰

——明代云南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与 儒学的跨越	(128)
---------------------------	-------

一、明代卫所与云南儒学	(128)
二、地主经济推动着儒学的昌盛	(139)

第六章 波浪进程 硕润而雨

——儒学与改土归流	(162)
-----------	-------

一、儒学促进了云南社会风气的变化	(162)
二、土官与土司	(169)
三、改土归流	(184)

四、三个典型.....	(199)
-------------	-------

第七章 春木载荣 布叶垂荫

——清代云南儒学	(217)
----------------	-------

一、清代云南书院和义学.....	(217)
------------------	-------

二、清代云南学额.....	(225)
---------------	-------

三、清代历科云南进士题名.....	(232)
-------------------	-------

四、清代滇人著述.....	(260)
---------------	-------

第八章 文化内辑 云南皆熟

——18世纪云南经济的跳跃	(285)
---------------------	-------

一、清初云南百废待兴.....	(285)
-----------------	-------

二、云南人口的增加及耕地的扩大.....	(288)
----------------------	-------

三、水利设施的改善.....	(293)
----------------	-------

四、农作物新品种的引种.....	(296)
------------------	-------

五、矿业的蓬勃发展.....	(300)
----------------	-------

六、食盐的自给.....	(305)
--------------	-------

七、交通市集形成网络，货币与内地接轨.....	(307)
-------------------------	-------

八、促成18世纪云南经济跨跃的基本因素	(315)
---------------------------	-------

后 记	(325)
-----------	-------

第一章 滥觞汉唐 衣被后世（上）

——儒学对云南的浸润

一、儒家、儒学和大一统

在西汉武帝以前，儒家地位不断有所上升，但它只是诸子百家众多学派中的一家。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各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汉武帝采其议，并通过封建政权杠杆自上而下进行强有力的推行，诸如下令民间献书，于是乎“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是时官学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发展为五经十四博士；汉武帝还将出身狱吏的公孙弘封侯拜相，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确立儒家独尊的地位。当然，经董仲舒加工过了的儒学中包容了各派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

由于自上而下对儒学的提倡，造成“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的局面^②，而“古之儒者，博学虞《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

① 《汉书·董仲舒传》卷 56，第 2523 页，中华书局版。

② 《史记·儒林列传》卷 121，第 3118 页。

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① 汉武帝大力“兴大学，置明师”^②，倡导推行儒学，一是为了行教化而稳定社会，如董仲舒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③ 也就是说，通过学校系统把儒家思想灌输给老百姓。仅以儒学中的乐而言，它能使“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从而达到“变民风，化民俗”的目的^④。二是为了选用人才，即“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⑤。看人是否贤能，是否有德，均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衡量，为此通过学校加以培育教化。三是为了国家清明，即“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⑥ 这是维护发展中央集权制封建大一统国家所必须的。以上是儒学的教育宗旨和目的。因此之故，自西汉直至清代，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并延续下来。

儒学教化的内容很多，惟以五经为主。孔子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

① 《汉书·儒林传》卷 88，第 3589 页。

② 《汉书·董仲舒传》卷 56，第 2512 页。

③ 同上，第 2503~2504 页。

④ 同上，第 2499 页。

⑤ 同上，第 2513 页。

⑥ 同上，第 2502~2503 页。